

把个体的苦难还原出来 装进国家记忆

请讲



费仲兴在南京郊区寻访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丛葬地。(资料片)

人物简介:

费仲兴, 1944年生, 1966年毕业于华东水利学院应用数学专业。1968年入伍, 1983年调入南京炮兵学院, 自此在数学研究室任教, 2004年退休。从2001年起, 自发调查南京城东郊汤山地区平民遭日军屠杀的情况, 被称为“南京大屠杀民间调查第一人”, 曾出版《城东生死劫》。

讲评专家 费仲兴

在南京市江宁区汤山东南有个不显眼的偏僻小村——西岗头, 村东有一座由村民自费筹建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西岗头遇难同胞纪念碑”。今年, 发生在西岗头的历史惨案被写进国家公祭日读本。南京大屠杀并不是在12月13日开始的。日军从句容往西攻打, 一路上早就杀开了。汤山是南京的东大门, 是日军进攻南京的必经之地, 那里的屠杀12月6日就开始了, 比南京城里早一个星期。

日本鬼子打来了, 村里的老百姓怎么办呢? 两个字: “跑反”! 男女老少, 跑得动的都跑, 只有极少数年纪大的、有病的、跑不动的留在村里了。

村民们有的跑到宝华山, 有的跑到龙潭北面的北圩, 有的躲在破庙里, 有的躲在树林里, 有的躲在芦苇荡里。天寒地冻, 北风呼啸, 大人小孩冻得瑟瑟发抖, 那日子真叫悲惨。他们在外一直躲到第二年春天快要下秧的时候才陆续回家。

也就是说, 这次跑反前后持续了5个月。

老百姓躲在外面, 带的粮食吃完了, 隔一阵就得回家挑米。1938年2月7日, 西岗头20多个小伙子回村挑米。第二天, 鬼子把全村包围起来, 把这些小伙子集合到小学操场上。机枪突然开火, 不到一分钟光景, 操场上血流成河, 惨不忍睹。

有一个人叫陈万有, 他排在第二排, 没有中弹, 晕倒在地上, 没有死。鬼子走后, 他醒过来, 捡了一条命。还有个男孩叫陈广顺, 14岁, 因为父亲有病, 留在家照料, 没有跑反。鬼子把他拉到操场上, 让他站在机枪旁边看, 没有杀他。

西岗头惨案, 日军杀死了21名身强力壮的小伙子。

跑反期间, 西岗头村有26家房屋被烧, 共计烧毁房屋91间, 损失的粮食、耕牛、家具、衣被更是不计其数。跑反过后, 回到家的村民没有住房, 没有粮食, 没有耕牛, 没有家具, 生活很悲惨, 全村长期处于极度贫困状态。

陈万有死里逃生, 一辈子也忘不了当时的恐怖场面。他一遍一遍地给村民讲, 从解放前讲到解放后, 后来年纪大了, 讲不动了, 去世了。

村里许多人都听他讲过, 有的人听了十遍、二十遍, 但是没有一个人记录过。为什么? 一是村里识字的人少, 不会写; 二是害怕, 怕被日本人知道了会倒霉。日本投降后, 也没人记录。他们说, 事情过去8年了, 日本都投降了, 记下来又有什么作用呢? 就这样, 西岗头遭受的苦难一直印在村民脑海里, 流传在口头上, 没有形成文字。

我从2004年开始在西岗头调查, 前前后后往那里跑了20多次, 获得了重要的口述资料。村民陈广顺是那场集体屠杀的目击者, 他身体好, 记忆力强, 哪个人在哪里被杀, 都记得清清楚楚。

随着十年的走访调查, 35人名单最后落实。如今, 西岗头遇难同胞的名单刻上了南京江东门纪念馆的“哭墙”, 西岗头惨案还被写入了国家公祭日读本, 进入了学生课堂。西岗头的民间记忆终于成为了国家记忆的一部分。

“打捞”西岗头遇难同胞这段历史, 意义不可小觑, 它的主要作用是教育下一代不忘历史教训, 凝聚人心。随着时间的推移, 打捞民间记忆显得尤为紧迫。

日本侵略者染指我国, 最早可追溯到1874年侵略台湾, 此后一直到1945年宣布投降, 侵略者在中华大地肆虐, 烧杀掠夺。其间被日军屠杀的都应成为公祭对象。灾难的历史, 理应成为民族记忆的重要组成部分。高规格举行国家公祭, 更需全民一起参与。

多年来, 民间自发的调查不曾间断, 南京、上海、金华……调查者的足迹遍及77年前被践踏的领土, 捡拾着散落民间的记忆碎片, 填补着历史的细枝末节。13年来, 我走访了100多个自然村, 为834名死难者找回被遗漏的姓名与人生, 为南京大屠杀这道历史证明题提供了更多的“证明条件”。

一个国家民族精神的提升, 离不开国家制度化的培养。设立抗日战争纪念日和南京大屠杀国家公祭日, 这不是在宣泄情绪, 也不是在倡导民族复仇, 而是把现有制度、历史记忆和人道原则做一次有益的结合, 根本目的是提醒我们不要忘记曾经的苦难历史, 珍惜当今的和平与发展。

历史记忆, 正是由当年在侵略者铁蹄下无数普通百姓的家庭受难史组成。打捞民间记忆, 更多是通过这些无数的个人视角, 让当代人了解他们的受难史和抗争史, 进而传承他们身上的“家国”精神。(本报深度记者 寇润涛 整理)

期待与追问

无论是聂树斌案, 还是考研个人信息泄露, 抑或春节放假, 近日舆论焦点事件核心之一, 便是我们每个人的“追问”: 没有舆论多年追问, 哪有聂案异地复查, 而少人追问, 等于变相纵容相关部门不作为, 到头来损害的还是公民自身利益。

聂树斌案异地复查真相可期?

上周五, 一则“最高法指令山东高院复查聂树斌案”的消息让很多人振奋。这意味着, 这起舆论关注多年的疑案或将迎来转机。

1995年, 19岁的聂树斌被以强奸和故意杀人罪执行死刑。10年后, 一个叫王书金的嫌犯, 却以对聂案犯罪细节异常精准的回忆, 成为该案几乎无可辩驳的“真凶”。

但是, 其后近十年, “疑案”竟无进展。2013年, 在对王书金的审判中, 甚至出现“被告坚称自己有罪, 但检察官却力证其无罪”的一幕。

真相到底如何? 某种意义上, 聂案已成为考量社会公平、司法公正的试金石。正因此, 异地复查的消息, 让关心中国法治进程的普通人都重燃希望。在依法治国大背景下, 我们期待聂案早日真相大白。

个人信息泄露 没人管吗?

聂树斌案重启复查, 很大程度上, 仰赖其家人、律师以及社会各界常年不断的追问。而即将走进2015考研考场的考生们, 也有自己的追问: 谁出卖了我的信息?

下周六, 全国研究生考试开考, 日前却传出130多万考生信息被泄露。其实早在10月, 便有网站发出警报说, 2015年研究生考试网站信息泄露, 并报警, 但似乎没有效果。

事实上, 个人信息泄露早就不是新鲜事, 中考、高考、公考……考生早习惯了收到“考试答案”、“报考指南”等有针对性的信息推送。有人戏言, 哪次不收几条这样的信息, 那才是新闻, 更不会有人费劲去追问, 到底谁出卖了自己的信息?

查询信息泄露的元凶, 技术上应该不难, 而之所以这种事屡禁不止, 除了相关部门不作为, 更重要的是我们没有追问乃至“逼问”。捍卫个人隐私是我们应有的权利, 而对相关部门不断问责, 则是这项权利毋庸置疑的保护神。

春节放假 能多个选择吗?

近日关于春节放假, 谁都忍不住要问几句。按照传统习俗, 过年从除夕开始, 但根据以往经验, 放假却有始于正月初一的先例。于是, 究竟是除夕放假, 还是初一歇班, 竟也成了问题, 以至于相关部门不得不进行民意调查。

类似的调查, 我们并不陌生。诸如水电价调整等, 每次也会开听证会, 名曰征求社会意见, 但最后往往成“涨价会”, 拍板决定权依然在相关部门手里。

如今纠结哪天放假, 但假期总数不变, 只能给人徒增烦恼。这背后还是一种计划、指令性的“家长式”思维: 你所有的选择权, 都在我设定的范围内。而我们要追问的是, 除了“非好即坏”, 还有没有其他选项, 比如能否延长假期, 将现有的7天改成8天, 这样既保证初一到初七的假期, 又能满足国人除夕过春节的习惯, 岂不两全其美?

本报深度记者 刘志浩

预见

且慢

“权力余热”的边界



周一波 (资料片)

周一波的辞职, 颇有些英雄主义色彩。

12月7日, 他从陕西省书法家协会主席位上转身离去, 一时引来无数喝彩。

无论是在职官员, 抑或是离退休干部, 发挥余热是有边界的。而喝彩背后更是期待, 希望周一波不是一个孤胆英雄。

本报深度记者 刘德峰

至少从2014年12月第一周的表现来看, 周一波确实是一个能“说到做到的汉子”。

12月2日, 他在人民日报刊文号召, “从政就不要往艺术界挤”, 包括书画家协会在内的各种艺术家协会应该进行清理整顿, 党政领导干部应该自觉退出协会主席团。

周一波发起此号召的理由是, 现在各种艺术家协会都有许多领导干部兼职当“领导”, “存在着腐败的危险”。这也就是民间所称的“雅贿”。

5天后, 在陕西省书法家协会2014年工作总结会议上, 曾官至陕西省政协副主席、统战部部长的周一波, 宣布辞去该协会主席一职。

“今天我带头退出书协主席职位, 是为了换来一个新的协会机制, 希望在陕西书协兼职的党政领导干部也限期辞职。”周一波在会上表示。

他的这套组合拳, 很容易让人

联想到2013年初陕西省书法家协会的换届风波。

2013年1月21日, 陕西省书法家协会换届, 一共选出了11位名誉主席、1名主席、16名常务副主席、18名副主席、10名副秘书长以及6名顾问。

62人的主席团阵容, 史无前例地臃肿, 其中不乏在职或退休的政府官员, 一时引起热议。

周一波当时表态, 要厉行改革。去年4月2日, 该协会出台《关于主席团成员及秘书长班子淘汰机制实施办法》, 内设机构也由16个精简为10个。

可以想象, 其间改革阻力有多大, 此次周一波辞职, 无疑有着“最后通牒”的意味。

而这场发生于个别省份、个别协会的调整, 之所以再次引发全国关注, 足以见得周一波所揭出现象的普遍性。

早在1994年, 国务院办公厅就下发过《关于部门领导同志不兼任社会团体领导职务问题的通知》, 明确要求“在职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 不得兼任社会团体领导职务。”显然这一通知并未执行到位。尤其是艺术界, 因为官员群体的渗透, 甚至出现了艺术水平和价位与职级挂钩的恶习。

在周一波看来, 不管是作为腐败的艺术外衣, 还是职级与艺术水平挂钩, 领导干部进入协会, “这对书画市场和艺术发展规律无疑是一种践踏”。

但是难有人像周一波那样打破潜规则, 主动站到公众面前喊出真相, 并带头退出。正是在这个意义上, 他颇有些英雄主义的色彩。而依规定, 2013年初就退休的

他, 本不在清退之列。“有些同志讲, 你不在兼职范围何必退, 我说这是我的自由。”周一波在工作总结大会上说, “当然官员退出书协也不仅是个人的事情, 还涉及到未来协会改革能否彻底到位。”

从没有人说领导干部不该有兴趣爱好, 周一波在文章中写道, “不可否认, 在领导干部中确有较高修养和艺术造诣的人, 他们不会去追名逐利, 离开协会反而更有利于他们的艺术再造。”

这是对别人, 更是对自己的劝诫。

除了退休领导干部的身份, 周一波还是中国美术家协会、中国书法家协会、中国音乐家协会和坝文化学会会员。他的书法和绘画作品曾多次在国内外展出并获奖, 更被人民大会堂、毛主席纪念馆、中国美术馆及欧美16个国家收藏。

退休领导干部、艺术家身份、陕西省书法家协会主席职位等种种身份叠加在一起, 让他的这次辞职已经有了足够的代表性。舆论点赞, 是赞赏其勇气, 亦是对清除权力腐败的期待。

政治的归政治, 社会的归社会, 艺术的归艺术, 说起来容易, 但要实现起来就难多了。君不见, 周一波辞职后, 至今还未有紧跟他的脚步离开社会团体兼职的干部群体出现。

不过, 十八届三中全会已经提出, 要完善并严格执行领导干部担任公职和社会组织职务等制度规定, 对某些领导干部来说, 真要等到改革彻底剪断利益脐带的那一天, 才想起来从社会组织中全身而退, 可能就晚了。